中国边疆地区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分析

廖乐焕，王 润

（云南民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昆明 650504）

摘要：中国边疆经济进入新阶段，在新常态下需坚持对外开放发展。基于2012—2022年9个边疆省份面板数据测算与分析发现：边疆地区开放水平具有明显梯度特征；东北、西北、西南3大区域间差异显著并呈现累积效应；区域内部省际差异突出，存在路径依赖；差异成因具有多重性。为此，应深化与周边国家融合，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坚持创新驱动，提升开放竞争力；优化产业结构，促进要素集聚；同时构建高水平开放体系，完善支持政策，增强韧性，推动边疆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边疆地区；开放发展；泰尔指数

中图分类号：F202；F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6)03－0206－08

中国边疆地区作为国家战略安全屏障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其对外开放发展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边疆地区不仅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文化和人员交流的重要门户，也是提升中国整体开放水平、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边疆地区必须发挥区位优势，积极融入区域经济合作，增强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与经贸合作，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稳定。

边疆经济是人们在边疆这一特定区域所进行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物质活动的总称。其中生产是经济的基础，流通和分配是过程，消费是经济过程的终点。中国最早研究边疆经济学的学者是徐晓光[1]，他建立了中国边疆经济学的概念。牛德林[2]提出了“超常发展战略”，认为边疆地区经济发展要坚持开放发展，“带来进步，封闭只会落后”，同时提出了“周观经济”与“要素跨国优化论”，将中国陆地边疆地区视作整体，在此基础上分析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他的“要素跨国优化论”指出，国际经济对话往往由贸易开始，贸易往来带动了生产要素、产品与技术的流动，在这一过程中，促进了贸易往来方的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资源合理配置。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阶段，中国边疆地区也在逐步扩大开放。1991年，中国接连开放边境口岸城市。1992年，中国着力建设边疆14个经济合作区，开启了边疆地区对外发展的新阶段[3]。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飞速发展，边疆经济学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新理论、新观点不断提出，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逐渐恢复并且开放边疆贸易。任烈[4]指出中国应将边境贸易纳入国家开放战略之中，并且立足国家发展全局，为边境贸易的发展提出政策指导，引领边境贸易向公平、规范、自由的方向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边疆经济开发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很多学者从各种角度丰富发展了边疆经济学。例如，冯建勇[5]梳理了列宁的边疆经济理论；吴楚克[6]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发展了边疆经济理论；金德谷[7]从“一带一路”角度对于边疆经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李光辉[8]立足新时代，提出了边疆经济理论的新认识，认为要站在国家全局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思考边疆经济发展，充分重视边疆地区特殊的战略地位与历史使命。

1920年，Turner[9]首次提出“边疆”这一概念，“边疆”地区在美国学术界中的地位与意义逐渐凸显。另一位边疆学派的学者Lattimore[10]不仅专注于美国边疆的研究，而是将眼光放在世界范围内的边疆区域，将边疆与边界的概念区分开来，重点强调了边疆的地带性含义，认为边疆不是简单的国界线，而是一片缓冲地带，重点研究了边疆的动态性，即边疆地区具有复杂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结构，这种复杂性需要学术界的学科交叉，要引入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来共同讨论边疆经济

收稿日期：2025-08-08

基金项目：2024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专项”一般项目(ZX2024YB44)

作者简介：廖乐焕(1975—)，男，江西赣州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王润(2000—)，男，山东济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

发展问题。Konrad 和 Szary[11]认为目前边疆动态性研究需要纳入 3 个组成因素:①发现边疆地区形成的原因以及变化过程;②边疆动态的特征,将其他学科的理论融入边疆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边疆动态性;③边疆的改变与重建,来探寻边疆地区演化过程中的变化性因素。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关于边疆经济学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发现,国内外学者都支持边疆地区开放发展,只有坚持边疆地区开放发展,才能促进边疆地区的繁荣稳定。基于此,结合 2012—2022 年中国边疆 9 省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构建对外开放发展指数,并引入泰尔指数对边疆地区总体及区域内部对外开放发展水平的差异进行测度与分解。研究旨在揭示新时代背景下边疆地区对外开放发展的实际态势与区域差异,以期为推动边疆高质量发展、缩小区域开放差距、增强国家整体战略布局提供政策建议。

1 研究方法与研究假设

1.1 研究方法

1.1.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各边疆省份的统计年鉴,时间范围为 2012—2022 年,空间范围为中国 9 个边疆省份(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西藏、甘肃、新疆)。在数据收集过程中,进行了数据清洗与核对:①剔除因统计口径或缺失造成的明显错误值;②对指标中的极端值(如个别年份外商投资额异常偏高)进行数据缩尾,采用 1%分位缩尾法进行修正,以避免少数极端值对整体测度结果造成过大干扰;③对于少部分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而当缺失年份过多时,则采用相近省份的平均增速进行测算填补,从而保持数据的连续性。

1.1.2 边疆地区 9 省对外开放发展水平测度

参考已有研究关于区域对外开放发展水平的测度[12],结合数据可得性与连续性、指标对对外开放水平的解释力度、不同维度之间的互补性与非重复性,选取了能够全面反映对外开放水平的指标体系,见表 1,包括对外贸易依存度、外商投资比重以及市场化指数。

表 1 边疆地区 9 省对外开放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开放发展	对外贸易依存度	进出口总额/地区 GDP
	外商投资比重	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地区 GDP
	市场化程度	地区市场化指数

通过熵权法构建中国边疆 9 个省的对外开放发展水平指数。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根据指标在样本数据中的信息熵大小来确定权重。熵权法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采用极差标准化公式进行数据标准化。

$$x'_{ij}=\frac{x_{ij}-\min x_j}{\max x_j-\min x_j} \tag{1}$$

式中:x_{ij} 为第 j 个指标在第 i 个评价对象上的原始值;$\min x_j$、$\max x_j$ 分别为第 j 个指标的最小值与最大值;x'_{ij} 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取值范围为 0～1。

(2)计算指标比重 p_{ij}。

$$p_{ij}=\frac{x'_{ij}}{\sum_{i=1}^{m}x'_{ij}} \tag{2}$$

式中:m 为评价对象个数。

(3)计算熵值 e_j。

$$e_j=-k\sum_{i=1}^{m}p_{ij}\ln p_{ij} \tag{3}$$

$$k=\frac{1}{\ln m} \tag{4}$$

式中:常数 k 能够确保熵值 e_j 的取值范围介于 0～1。

(4)计算冗长度 d_j,冗长度反映了指标含有的有效信息量。

$$d_j=1-e_j \tag{5}$$

(5)确定权重。

$$\omega_j=\frac{d_j}{\sum_{j=1}^{n}d_j} \tag{6}$$

式中:ω_j 为第 j 个指标的权重;n 为指标的数量。

(6)计算综合得分 S_i。

$$S_i=\sum_{j=1}^{n}\omega_j x'_{ij} \tag{7}$$

1.1.3 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Theil index)是由泰尔(Theil)利用熵概念计算收入不平等而得名,现多用于地区差异测算研究。泰尔指数大于等于 0,值越大差距越大,反之越小。相对其他测度地区差异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T=\sum_{i=1}^{n}T_i\ln(nT_i)=\mathrm{TWR}+\mathrm{TBR} \tag{8}$$

$$\mathrm{TBR}=T_{\mathrm{E}}\ln\frac{n}{n_{\mathrm{E}}}+T_W\ln\frac{n}{n_{\mathrm{w}}}+T_{\mathrm{N}}\ln\frac{n}{n_{\mathrm{ns}}} \tag{9}$$

$$\mathrm{TWR}=\sum_{i=1}^{n_{\mathrm{E}}}T_i\ln\left(n_{\mathrm{E}}\frac{T_i}{T_{\mathrm{E}}}\right)+\sum_{i=1}^{n_{\mathrm{w}}}T_i\ln\left(n_{\mathrm{w}}\frac{T_i}{T_{\mathrm{w}}}\right)+\sum_{i=1}^{n_{\mathrm{s}}}T_i\ln\left(n_{\mathrm{s}}\frac{T_i}{T_{\mathrm{s}}}\right) \tag{10}$$

式中：T_E、T_w、T_s分别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以及西南地区对外开放发展水平与中国边疆地区总体对外开放发展水平的比值；T_i为第i省份的对外开放发展水平与中国边疆地区总体对外开放发展水平的比值；n_E、n_W、n_s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省份个数；TBR为带间差距；TWR为带内差异。

1.2 研究假设

1.2.1 区域梯度发展理论

根据迈达尔理论，“随着一国或地区经济的发展，在生产方面会出现两种趋势，生产要素会向某些区域集中以及向某些区域扩散的趋势。区域发展呈现梯度式发展。高梯度地区要解决经济动力不足的问题，这需要高梯度地区不断创新，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而区域发展低梯度地区，要及时接受高梯度地区所淘汰的优势产业，一般是具有较大比较优势的初级产业”。而在中国边疆地区，这一梯度特征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从国内来看，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中国边疆地区各个省份大多处于低梯度区域，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产业结构相对低级且单一，其偏重于初级产品和资源型产业。因此，边疆地区亟须要素承接和产业转移，进而有效引进先进地区的技术与资本，加快本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而实现经济结构优化。例如，东北老工业基地在产业转移中可以引入新兴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而西南边疆地区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口岸经济，促进产业集聚。另一方面，从国际来看，边疆地区与众多发展中经济体或资源依赖型国家（如老挝、越南、蒙古、哈萨克斯坦等）相邻，其在资本、技术、市场建设和制度设计方面均弱于中国边疆省份。由此，边疆地区则又相对处于高梯度位置，因而能够凭借产业外溢和市场辐射，大力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开放合作。例如，广西通过与东盟对接形成区位优势，在农产品加工与服务贸易方面实现对外辐射；新疆借助“一带一路”，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能够在能源、原材料和跨境物流方面发挥对中亚的引领作用。

综上，中国边疆地区的开放水平不仅受到国内梯度差异的影响，还受到对邻国市场势能、跨境交通通道建设及区域合作平台完善程度的共同制约。梯度条件越优越、承接与辐射功能越强的地区，其开放发展水平也越高。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中国边疆地区的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梯度特征，其差异主要源于国内外双重梯度作用，不同区域因梯度条件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开放水平。

1.2.2 循环积累因果论

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指出，区域发展并非同时均衡发生，而是通过“回流效应”与“渗溢效应”的动态博弈产生累积效应。经济基础较好、开放水平较高的地区，更容易吸引资本、技术和高素质劳动力，形成“开放-集聚-再开放”的正向循环，不断扩大领先优势；而反观经济基础薄弱、开放度较低的地区，则可能因要素外流、市场狭小和政策支持不足而陷入低水平锁定，形成“负向循环”。在中国边疆地区，这种累积效应尤为突出。一方面，黑龙江、广西等能够依托口岸经济和区位优势的省份，通过中俄贸易、东盟市场的带动效应形成较为强大的开放集聚力，持续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西藏等地区由于地理位置限制、市场规模不足、基础设施落后等自身不利因素，即便在国家政策支持下，也难以推进要素集聚和产业升级，容易陷入“开放程度低-要素流失-发展乏力”的恶性循环。由此，边疆地区对外开放发展水平的差异不仅体现在3大区域之间，也体现在同一区域内部省份之间，并且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更为值得关注的方面是这一累积因果机制会导致差异的逐步扩大：开放基础较好的省份更有机会通过贸易便利化、延长产业链和人才吸引形成持续增长，而开放基础薄弱的地区则在缺乏外部要素引入的情况下进一步边缘化。这种累积效应的巨大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西南地区内部差异显著扩大，而西北地区相对保持稳定。中国边疆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不同、资源禀赋不同、自身社会结构以及历史因素等一系列客观情况的不同，必然存在对外开放发展水平的差异。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2：中国3大边疆区域（东北、西北、西南）的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空间差异，这种差异在循环累积因果机制作用下会持续强化。

H3：边疆地区内部各省份的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且开放基础较好的省份更容易形成正向循环实现持续提升，而基础薄弱的省份可能陷入负循环，导致省际差异不断扩大。

2 边疆地区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差异分析

近年来，边疆地区正在积极恢复对外开放发展，助力国家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但是由于中国边疆地区复杂多样、分布广泛且不均，各自区域内省份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发展历史等因素各不相同，基于此，运用泰尔指数分析各边疆地区及其内部省份的对外开放发

展水平差异。

2.1 边疆地区9个省份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增长率差异

2013—2022年,中国边疆地区9个省份的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呈现空间异质性,并且各个省份的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增速各不相同(表2)。

从各年增速看,增速最快的依次为甘肃、黑龙江、甘肃、吉林、辽宁、吉林、吉林、广西、广西与广西;2013—2022年增速最慢的依次为西藏、西藏、西藏、西藏、新疆、西藏、辽宁、西藏、西藏、西藏。各省份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年增速大小,不仅与上一年的基数有关,还与当年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国家政策有关。

从平均增速看,前3位分别是广西、吉林、甘肃,位居后3位的分别是新疆、内蒙古、西藏。3大地区平均增速由快而慢依次为西北地区(1.643%)、东北地区(1.638%)、西南地区(0.503%)。

2013—2022年,中国边疆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增速呈现波动式变化,自2013年开始,由1.31%下降到2015年的0.43%,降幅达0.88个百分点。随后2016—2019年,呈现波动式上升。最后2020—2022年呈现断崖式下降,降幅达到2.12个百分点。由图1可以看出,通过“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支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等国家发展战略,边疆地区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在2019年之前保持较高且稳定的增长水平。

3大地区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年增长率呈波动下降趋势,其中2020年之前,东北地区与西南地区都呈现出负增长趋势,而2020—2022年3大区域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年增长率均呈现下降趋势,但具体表现存在区域差异。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平均增速还是从各年增速来看,各地区快慢不一,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中国需要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统筹边疆各地区的开放发展。同时,由于各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与经济状况各不相同,中国要因地制宜,发挥边疆地区自身优势,在维持社会基本稳定与祖国繁荣统一大局的前提之下,稳步推进各地开放发展。在世界经济低迷的宏观情况之下,边疆地区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持续提升对外开放发展水平。

2.2 泰尔指数测度的中国边疆地区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差异

利用泰尔指数的测算及分解方法,得出2012—2022年中国边疆地区对外开放发展水平的总体、带内、带间泰尔指数及其趋势图(图2),贡献率如图3所示。

图2表明,2012—2022年中国边疆地区对外开放发展水平总体泰尔指数与组间泰尔指数,组内泰尔指数较为平稳,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总体泰尔指数由0.018 56上升到0.052 96,组间泰尔指数(TBR)由0.009 84上升到0.044 71,组内泰尔指数(TWR)由0.008 72下降到0.008 25。这说明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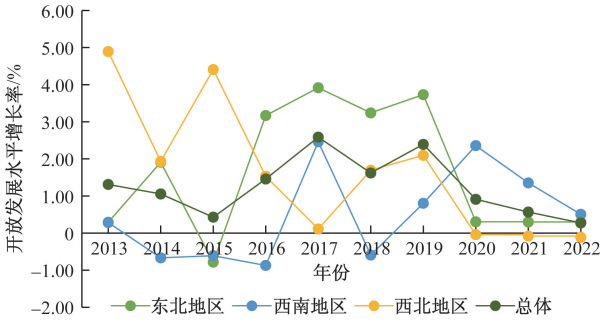


图1 边疆地区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年增长率走势

表2 边疆地区9省份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增长率

省份	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增长率%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内蒙古	−3.40	0.14	3.17	0.73	−0.32	−4.59	3.77	1.31	1.29	1.27
辽宁	0.06	2.02	−2.89	2.43	7.23	3.59	−1.07	−0.33	−0.33	−0.33
吉林	4.05	0.71	1.28	7.96	5.90	10.96	7.58	−0.23	−0.24	−0.24
黑龙江	0.46	4.77	−4.70	1.56	2.85	2.99	4.64	0.48	0.48	0.47
广西	3.36	3.98	2.52	−0.10	3.81	0.41	2.80	16.55	14.20	12.43
云南	1.54	2.92	2.72	−0.28	3.55	2.57	0.11	−1.88	−1.92	−1.96
西藏	−4.05	−8.90	−7.07	−2.23	0.02	−4.75	−0.50	−7.59	−8.22	−8.95
甘肃	5.79	2.04	6.96	2.71	0.90	2.37	2.69	1.84	1.80	1.77
新疆	4.00	1.83	1.86	0.34	−0.68	1.02	1.50	−1.92	−1.96	−2.00
平均	1.31	1.06	0.43	1.46	2.59	1.62	2.39	0.91	0.57	0.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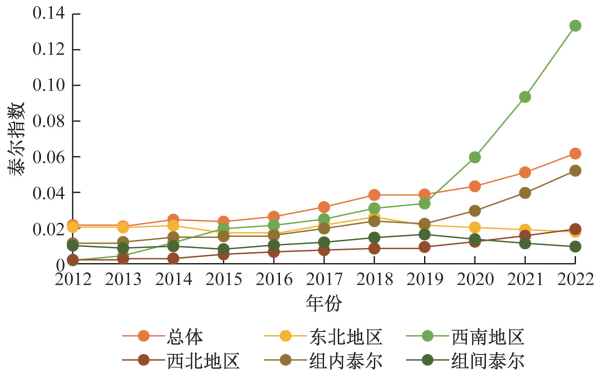


图 2　边疆地区对外开放发展水平泰尔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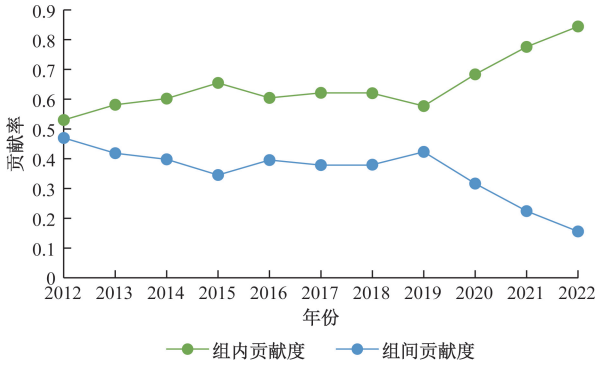


图 3　带内与带间泰尔指数对总泰尔指数的贡献率

然中国积极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促进边疆地区对外开放，特别是“一带一路”、对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的构建，但是中国边疆地区对外开放发展水平的差异水平较大，总体泰尔指数水平在逐年上升，说明中国边疆地区的开放发展仍然有较大上升空间，总体统筹发展还需政府的不懈努力。

组内泰尔指数对总体泰尔指数的贡献率稳步上升，带间泰尔指数对总体泰尔指数的贡献率稳步下降。说明，中国边疆地区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带内差异大，带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体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边疆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构建仍然需要中国政府的统筹规划。一方面，中国要站在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全局，统筹各边疆地区的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的背景之下，各边疆地区由于各地的自然环境、经济基础等方面的不同，各地也要发挥自身优势，在维系边疆安定团结与维护与邻国关系稳定的前提之下，因地制宜，按照东西部边疆区域差异化的支持政策逐步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均衡对外开放发展。

比较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 3 大区域的泰尔指数，研究发现，西南地区泰尔指数最高，西北地区泰尔指数最低。11 年间，西南地区泰尔指数由 0.001 63 上升到 0.114 36，上升幅度极大。东北地区泰尔指数呈现稳定下降趋势：2012—2018 年呈现波动上升，2019—2022 年逐年下降，总体下降幅度达到 12.93%。2013—2022 年西北泰尔指数呈下降趋势。西北地区泰尔指数由 0.001 89 下降到 0.001 63，总体下降幅度巨大。这说明，西南地区相对于西北地区与东北地区内部差异要大。

值得一提的是，用泰尔指数衡量的中国边疆地区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差异逐渐加剧，只能说明特殊时期中国边疆地区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差异相较以前逐渐加剧。但并不意味着各地区内部的省份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在全面退后。结合边疆 9 个省份的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年增速来看，在全国边疆地区总体对外开放差异扩大的过程中，那些经济基础良好、社会环境稳定、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水平，如黑龙江和广西。这些省份的先进对外开放经验可以辐射周边以及其他边疆地区，促进总体边疆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差异趋于缩小。

3　边疆地区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差异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前文对中国边疆地区对外开放发展水平的测度与对比，可以发现不同区域、不同省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既来源于宏观战略环境，也和各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与政策设计紧密相关。

3.1　区位条件与口岸环境差异

地理位置是边疆地区对外开放发展的重要客观条件。中国边疆地区大多建设口岸，这是中国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的重要通道。然而，不同区域在地理区位和口岸建设方面存在显著差别。中国东北地区拥有众多的陆路口岸，然而其开放国家单一，多数为对俄贸易。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这种依赖使其对外开放水平大幅波动。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接壤，具有强大的区位优势，理论上具有较强的对外开放发展潜力，但西南地区存在严重的交通瓶颈，这使得通关效率大幅降低，客观上限制了这种潜力的释放。中国西北地区依托中亚陆路通道，口岸资源相对集中，但其一旦遭受外部冲击便缺乏替代性通道，导致其对外开放发展的脆弱性日益显现。此外，不同省份的边境线长度差异也是影响开放水平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边境线越长，其拥有的口岸布局空间和跨境交

流机会也会越多,如内蒙古、新疆和西藏的边境线远超于甘肃和辽宁,在空间上具备更大的开放发展可能性。然而,过长的边境线同时也会带来治理成本和安全风险,尤其在交通基础设施薄弱或周边国家局势动荡的情况下,长边境线并不必然转化为开放优势。反观边境线较短的省份虽然跨境交流空间有限,但若通道集中、交通便利且制度型开放水平较高,仍可能在对外开放水平上表现突出。由此可见,地理条件和口岸资源差异是造成边疆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差异的首要原因。

3.2 产业结构与经济基础差异

产业结构和经济基础构成了对外开放的内生动力,而边疆地区经济动力不足愈发凸显,主要原因在于粗放式发展时代支持边疆经济高速发展的3大传统比较优势:优良的区位优势、充足的资本投入以及劳动成本低廉已经难以为继,具体表现为资源与生产要素不足、劳动力资源不足和资本投入严重下滑[13-17]。中国东北地区长期依赖资源密集型与劳动力产业,产业结构滞后,新兴产业发展滞后,使其对外开放竞争力有限。西南地区在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中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其外贸产品较为初级,导致其在应对国际市场环境恶化时,缺少抵御风险的抗压能力。西北地区整体经济基础薄弱,对外开放发展更多依赖能源和农产品出口,外贸结构单一,缺乏高附加值产品的带动。这种产业结构上的不平衡不仅制约了区域间开放水平的提升,也使得边疆地区整体开放缺乏持续动力。

3.3 政策支持与战略落实差异

近年来,中国出台多项国家级战略,为边疆地区创造良好发展机遇,但各地在政策设计与落地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开放发展水平逐渐分化。西南和西北地区凭借“一带一路”倡议,强化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口岸通道升级,使得开放水平在疫情前保持了相对快速的增长。同时,部分省区通过经济合作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平台建设,积极探索新型对外开放路径。反观东北地区,虽然具有“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支持,但在体制机制创新、营商环境改善和产业结构转型等方面推进缓慢,政策支持效应未能充分显现。由此可见,政策支持固然重要,但政策落实和区域承接能力才是影响对外开放水平差异的关键。

3.4 外部冲击与环境不确定性差异

外部冲击与环境不确定性是造成中国边疆地区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出现断崖式下降的直接原因。由于边疆地区对外依存度较高,口岸经济发展在特殊时期频繁受阻,贸易往来、投资建设和人员流动均受到严重影响。此外,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同样提高边疆地区的开放发展风险。例如,缅北电诈威胁、俄乌冲突爆发与中美关系紧张等,都对边疆地区的对外合作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加之边疆地区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对单一市场和既定通道的依赖较强,这往往使其承受更大的冲击。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1)边疆地区开放水平呈现明显的梯度特征。整体来看,中国边疆地区总体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差异以2019年为分界,2019年之前总体开放水平较高,然而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边疆地区对外开放发展水平也受到不同程度打击,导致区域对外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差异逐渐扩大。结合区域梯度发展理论可知,中国边疆地区相较东部沿海地区处于低梯度位置,经济基础薄弱,但其面向周边发展中国家时又处于高梯度位置。因此,不同省份因梯度条件差异在开放水平上表现出显著差异,假设H1得以验证。

(2)3大区域之间的开放差异显著,且具有累积效应。2012—2022年3大地区平均增速由快而慢依次为西北地区(1.643%)、东北地区(1.638%)、西南地区(0.503%),对外开放发展水平的泰尔指数表明,东北、西北与西南3大区域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结合循环累积因果论可知,拥有良好开放基础的区域能够通过发展口岸经济和推动产业升级形成“开放-集聚-再开放”的良性循环,而开放基础薄弱的区域则可能陷入“低水平开放-要素流失-发展乏力”的恶性循环。假设H2得以验证。

(3)区域内部省份差异同样突出,并呈现路径依赖。泰尔指数测度结果表明,带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不断上升,说明省际差异已成为影响边疆地区开放水平不均衡的主要因素。东北内部表现出开放水平的普遍低迷,西南内部差异逐渐扩大,而西北内部相对稳定。这印证了假设H3,即边疆地区内部开放基础较好的省份能够持续提升,而基础薄弱的省份则容易陷入负循环。

(4)差异背后的原因具有多重性。边疆地区开放差异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由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所致:①地理区位与口岸条件不同,决定了开放

的物理基础；②产业结构与经济基础存在差异，决定了开放的内生动力；③政策支持与战略落实程度不一，导致区域间承接国家战略的成效差异；④突发事件与国际环境冲击放大了边疆地区对外开放的不均衡。这些差异性因素共同塑造了边疆地区开放发展的空间格局。

4.2 政策建议

(1)促进边疆地区与周边地区深度融合，稳步推进边疆地区协调发展。边疆地区拥有独特的区域发展优势，边疆地区的独特优势在于，边疆地区拥有更为便捷的跨境运输条件。发达的交通条件为构建开放的营商环境创造了必要条件。开放的营商环境有利于边疆地区打造开放的市场环境，提升市场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加强边疆地区与周边地区的区域合作。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一方面，要深化对内经济联动。边疆地区要深入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优先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边疆地区国内联动发展。另一方面，边疆地区要加强对外经济交流。中国可在全面履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义务的基础上，深化“一带一路”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利用现有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拓宽中国边疆地区的对外发展空间。通过深化边疆区域经济合作，促进边疆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对外开放发展水平，缩小边疆地区对外发展差距。

(2)大力推进边疆地区创新发展，提升边疆地区综合竞争力。在传统经济发展优势逐渐消逝的背景下，边疆地区唯有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创新培育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新优势、新产业与新动能。要培育边疆地区创新能力，首先，要加强边疆地区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由于边疆地区的特殊地理环境，加之中央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的匮乏，创新所需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其次，边疆地区难以吸引与留存创新型人才，要加强边疆地区人才财政预算，完善“产学研”相结合的体制机制，提升边疆地区创新型人才水平。最后，要强化边疆地区招商引资能力。边疆地区想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缺乏足够的资本投入，加之当地严重的资本流失，使得边疆经济创新发展难以为继。边疆地区要优化招商引资体制机制，吸引资本内流，为创新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3)推动优质生产要素向边疆集聚，助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集聚生产要素是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伴随中国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资源要素的空间分布也在持续演进。当前，中国正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要素集聚已成为中国边疆地区推进市场化改革、打破产业发展瓶颈的关键路径。首先，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为要素聚集提供基础保障。要大力提升口岸智能化水平并提高通关效率，建设公路、铁路、航空、管道一体化的立体交通网络。同时，将数字化融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疏通要素流通渠道。基于边疆地区的现实需求，执行基础设施精准化建设，提升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其次，培育边疆地区高级生产要素。应将高端人才作为突破口，建立健全创新技术与人才支撑体系，深化政产学研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特别是在外贸、制造等重点行业加强研发型和技能型人才队伍建设。最后，要促进边疆地区产业创新，加强招商引资相关优惠政策的支持力度，发展地方特色口岸贸易区，打造边疆地区特色产业集群，助力边疆地区产业振兴，助力其创新发展。

(4)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态，塑造边疆对外开放新格局。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资源在区域与市场之间的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然而这需要依赖于完善的制度与高效的开放体系。①提升边疆地区制度型开放水平。应在现有既定的贸易协定基础上进行整合升级，在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和国企改革等方面提出具有边疆特色的规则主张。②加强边境城市的集聚与辐射功能。城市规模通常是资源配置能力和对外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要加快培育具有强大支撑能力的新边境城市群，在政策方面给予其更多自主权并实施针对性扶持政策，致力于提高边境城市群在对外开放中的战略定位。③深化“一带一路”建设，提升边疆地区沿边开放参与度。构建自贸区和综合保税区的政策累加优势，扩大边疆地区特色边贸产品及服务的出口，培育边贸新型比较优势[18]。同时，推动边疆地区企业在海外建立营销网络和海外仓库，提升国际市场拓展能力与综合竞争力。

(5)完善政策体系，多方位全面促进边疆地区对外开放。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形势，边疆地区经济发展要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长远视角，做出适应性、针对性调整，这需要对边疆政策设计进行及时准确的调整。①从顶层设计来看，对边疆地区政策进行总体设计，进一步分化边疆省份的功能定位，结合各地自身优势与经济基础，形成优势互补、动态协同的

边疆经济发展总体格局[19];②从配套制度来看,边疆地区政府要准确自身定位,结合东北亚、东盟、中亚等地区的不同地域特点与地缘优势,完善跨境产业布局和特殊优惠政策,在重点区域设立对应的跨境经济合作平台[20],同时注重与国家战略的政策配合,充分发挥边疆地区对外开放的前沿优势,突出地方特色,避免重复建设;③从政策举措来看,结合综合市场调研,以精确把握市场需求变化为基础,提高边疆地区政策扶持的精准度,完备政策效果评价体系,对滞后性的政策予以退出,对重复政策进行整合,并及时公布政策变动信息,妥善处理不同政策和部门之间的协同关系。

参考文献

[1] 徐晓光. 边疆经济学初探[J]. 学术交流, 1986(6): 106-108.

[2] 牛德林. 全方位对外开放与边疆经济的超常发展[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3] 周林洁, 李光辉. 沿边开放进入新一轮热潮[J]. 经济, 2011(8): 64-66.

[4] 任烈. WTO与世界贸易自由化展望[J]. 南方经济, 1996(9): 52-55.

[5] 冯建勇. 列宁对边疆经济问题的剖解[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5, 25(4): 14-22, 179.

[6] 吴楚克. 发展边疆经济与创立边疆经济学的思考[J]. 中国图书评论, 2015(12): 8-10.

[7] 金德谷. "一带一路"与边疆经济发展: 基于满洲里市的税收分析[J]. 广西民族研究, 2016(1): 156-163.

[8] 李光辉. 边疆经济学概论[M].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22: 17.

[9] TURNER F J.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M].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20.

[10] LATTIMORE O.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1] KONRAD V, SZARY A L A. Border culture: theory, imagination, geopolitics[M]. Abingdon, Oxfordshire, UK: Taylor and Francis, 2023.

[12] 李光辉, 高丹. 构建边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综述[J]. 东北亚经济研究, 2020, 4(5): 94-109.

[13] 杨永芳, 王秦. 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24(S1): 182-190.

[14] 李光辉. 新形势下对中国沿边开发开放的新思考[J]. 国际贸易, 2017(8): 4-7.

[15] 蔡昉.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1): 56-71, 206.

[16] 王垚. 中国边疆经济70年: 政策演变与发展挑战[J]. 当代经济管理, 2020(3): 12-20.

[17] 郑挺国, 黄佳祥. 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区间的冲击来源及其差异性分析[J]. 世界经济, 2016(9): 28-52.

[18] 张静. 边疆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法治建设现状与完善[J]. 北方经贸, 2025(8): 74-79.

[19] 李光辉, 王若琳. 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现实约束与突破路径[J]. 经济纵横, 2024(2): 41-47.

[20] 权金亮, 刘艺卓, 尹文渊. 边疆地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成就、问题及对策[J]. 东北亚经济研究, 2023, 7(6): 16-27.

Analysi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Level of Opening-up in China's Border Regions

LIAO Lehuan, WANG R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4, China)

Abstract: China's border economies enter a new phase, necessitating adherence to open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normal.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nine border provinces from 2012 to 2022, it is found that the level of openness in border regions exhibits a distinct gradi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the three major regions of Northeast, Northwest, and Southwest, with cumulative effects, significant inter-provincial disparities within regions, with path dependence, and multiple causes of these differences. To this end, we should deepen integration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promote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dhere to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to enhance open competitiveness;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romote factor aggreg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build a high-level opening-up system, improve supporting policies, and enhance resilience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order economies.

Keywords: border regions; open development; Theil index